

考古发现所见六朝江南的文化演进

赵壮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

摘要：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古代一段极为重要的转折期。该时期虽然政治分裂，但经济不断发展，文化随之演进。基于秦汉时代辉煌灿烂的文化积淀，伴随着永嘉乱后的人群流动，南北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融汇、中华文明深入演进的历史面貌，散发出绚烂光芒。而此时代特征，也反映在不断出土的考古文物上。这些考古文物不仅在承续江南文脉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在江南文明探源、江南地域史等学术研究层面，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六朝；考古；江南文化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06.112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六朝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是一段极为重要的转折期。无论是人群的流动，玄儒文史的发展，还是南北间、中外间的交流交往，这些变化都使得先秦秦汉以来沉淀的知识、文化、艺术等要素，在六朝时代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升华，最终形成了绚烂华丽的隋唐文明。而这一历史时代脉络，也充分体现在六朝江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中。本文拟从考古发现所见时代文化特征、学术价值、历史意义三方面，试加论述。

一、考古材料所见六朝江南的时代风貌与文化特征

六朝虽然政治分裂，但经济不断发展，文化随之演进。基于秦汉时代辉煌灿烂的文化积淀，伴随着永嘉乱后的人群流动，南北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融汇、中华文明深入演进的历史面貌，散发出绚烂光芒。而此时代特征，也反映在不断出土的考古文物上。

以六朝都城建康而言，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它在规划设计上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自秦汉魏晋时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宫城布局。与此同时，它对北魏洛阳城以及稍晚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3-6世纪东亚世界的文化中心，六朝建康城的规划也在朝鲜半岛的百济都城泗沘城、新罗都城王京，以及日本列岛的藤原京、平城京等城市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

在六朝江南地区的六朝时期墓葬中，大量的青瓷器被出土，这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南方对北方文化的影响。青瓷器在这个时期成了南方手工业的典型代表，而江南则是青瓷器的核心产区之一，并对荆楚、岭南等南方地区的瓷器制造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北方，也可以看到中原地区的北方从墓葬中出土的瓷器开始模仿南方青瓷器，包括器型和纹饰等方面。由于南方青瓷制造技术的影响，从六世纪中叶开始，北方逐渐出现了白瓷和黑瓷器，这既模仿了南方青瓷器的制作方法，也逐渐形成了具有北方特色的陶瓷工艺体系。这

种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和影响在当时的陶瓷制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然，这一时期南方也受到了北方文化的深刻影响。考古实物资料中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石窟造像的传统源于印度，随着佛教的东传，它先后进入新疆、中原，最后传播到南方。这三个地区的石窟艺术各具特点，同时也相互影响，生动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在文化上的多元融合。

例如，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除了传统的通肩大衣形象外，在北魏太和年间还出现了褒衣博带式的佛装。有学者认为，这种佛教造像风格的变化与北魏孝文帝进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相关。此外，随着北魏迁都洛阳后，汉化改革深入进行，北魏后期的洛阳龙门石窟出现了一些面容瘦削的“秀骨清像”，同样穿着褒衣博带，雕刻技法也从早期的直平刀法向圆刀法转变，艺术风格逐渐由浑厚粗犷变得优雅端庄。这显然与当时南北文化交流以及南朝文化作为“华夏正朔”的向北传播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南朝佛教石刻——南京栖霞山南朝千佛岩石窟，无论从开凿历史还是具体造像风格来看，也都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影响。这些例子充分表明了南北文化交流在当时佛教石窟艺术中的重要性。

此外，考古文物资料，墓志和碑帖都反映了南北文化交流融汇和相互影响，最终走向一统。古代中国书法的演变与发展，在南方和北方都经历了从隶书到楷书的发展过程，但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在南方，自东晋中期到刘宋初期，隶书字体仍然存在，但楷书已经形成。到了刘宋中叶以后，楷书成为主流，尽管隶书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北魏的书法主要以楷书为主，篆书和隶书相对较少。随着南北方书体向楷书的不断演进，书法习惯和鉴赏风格也逐渐趋向一致。字体的组织变得严谨而奔

放，疏密有致，书写自如。这一演进为唐代的书法名家如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的出现以及经典字体的形成奠定了关键基础。这些书法发展和文物资料都展示了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汇，同时也为后来的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

六朝时期还是一个注重唯美艺术的时代，人们在这个时期懂得欣赏美，并追求艺术的审美效果。这种对艺术审美的追求在江南地区近年来新发现的各类考古文物资料中得以充分体现。

就造型风格而言，这一时期的器物不仅注重实用性，而且非常注重艺术上的审美效果，实用性与美观性得到了充分统一和协调。以六朝时期墓葬中最常见的青瓷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器物的形态和设计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以更好地满足实际使用需求。例如，盘口壶的设计在东晋时期经过多次调整，比例、线条和造型更加合适，同时也更加方便实用。鸡首壶的把手也在东晋以后加长，口颈变高和加长，使其更适合实际使用，同时更加优雅。汉代流行的耳杯在这一时期逐渐被托盏取代，既方便饮茶又美观。唾壶在汉代已存在，但几乎没有盖子，而在这一时期的唾壶多配有盖子，既卫生又美观。此外，青瓷器的装饰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包括弦纹、波浪纹、菱形纹、蕉叶纹等，还有贴塑的铺首衔环和点彩装饰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瓷器的纹饰变得更加精致，纹饰的种类也更加丰富，包括圆圈连珠纹和多种堆塑雕塑花纹。东晋时期，青瓷器的纹饰趋向简化，而点彩装饰的器物逐渐增多。南朝时期，青瓷器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以莲花纹为主要流行，其中南京仙林灵山大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更是极具代表性和审美价值的珍贵文物。总体而言，六朝江南地区出土的青瓷器在形态上呈现出从较小到较高大、从扁矮到修长、器物轮廓从刻板圆弧线到富于变化的优美曲线的整体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器物的类型也变得更加丰富。这一系列变化充分展示了当时人们对器物使用的追求和对艺术的敏感，精益求精的追求也为后来的艺术和文化遗产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除青瓷器外，这一时期的金银器、陶器、神道石刻、墓砖等考古文物也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唯美的艺术追求。

六朝江南地区考古出土的六朝时期的金银器则展示了当时金属加工工艺的高超水平。例如，东晋张迈家族墓地出土的镂金饰片非常精细，而金步摇、金爵钗等金银器物的造型也秀美动人，令人叹为观止。这些文物反映了当时工匠们在金银器制作方面的卓越技艺。

此外，考古发现中众多的陶器也具有鲜明的审美文

化特征。孙吴和西晋时期的陶明器模型展示了实际生活场景，包括家禽、家畜、农业生产工具等，有些小动物的塑造栩栩如生，令人感到生动真实。虽然生产用具的制作相对简单，但也十分逼真，可以看作是实物的微缩版。

在墓砖方面，六朝江南地区出土的六朝时期墓砖数量庞大，装饰花纹成为主流，代表了时代气息。纹饰包括钱纹、斜线纹、几何纹、蕉叶纹、云雷纹等，这些花纹源自汉代画像石和实用器皿上的主流装饰。随着时间的推移，纹饰逐渐丰富，包括植物花纹、神话题材纹饰等。南朝时期的墓砖纹饰更加多样化，包括缠枝莲花纹、莲瓣夹斜方格纹、卷草纹、忍冬纹、狮子、麒麟等，其中莲花纹最为盛行。此外，砖拼壁画也成为高等级墓砖的常见装饰，如南京狮子冲萧梁昭明太子墓内的砖拼壁画。南朝陵墓石兽如石麒麟和石辟邪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它们的形态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生动展现了当时的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

总而言之，六朝江南地区考古发现的六朝时期文物制作精湛，装饰秀丽，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艺术唯美的追求和对审美价值的高度重视。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艺术的珍品，反映了南北文化交融和中西文化交流对当时艺术的深远影响。

二、六朝江南考古材料的学术价值

以上所述遗迹、文物等考古新发现，不仅在承续江南文脉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意义，在江南文明探源、江南地域史等学术研究层面，更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为数众多的遗迹、文物，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深入认识某些重大历史问题，通过“文”（传世文献）与“物”（考古发现）的结合，展开专题讨论与综合研究，并且还能补充传世历史叙述中的缺漏细节。在此举出若干案例加以说明：

1. 士族门阀制度研究：在六朝时期，士族门阀制度是政治社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些门阀士族通常通过内部通婚联姻来维护其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特权。传世文献中虽然记载了一些相关事例，但数量有限且信息简单。然而，出土的墓志志文中包含了家族谱牒和联姻信息，对于复原和分析当时世家大族的婚姻网络提供了关键数据，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门阀制度的运作和影响。

2. 侨州郡县研究：永嘉南渡后，东晋南朝政权设立了多个侨州郡县，这是当时行政区划领域的重要举措。然而，传世文献对于这些地区的记载有限，且存在错误。通过出土的墓志、地券、砖铭等文物的文字记载，

不仅可以准确确定侨州郡县的名称和地位，还有助于澄清相关历史信息，填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之处。

3. 庄园经济和南方开发研究：六朝时期南方的开发和全国经济重心向南移是时代的重要特征。庄园经济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出土文物中的买地券、堆塑罐等形象反映了门阀士族兼并土地、营建庄园的历史事实。这些文物提供了直观的证据，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

4. 江南社会生活历史图景：各种生产、生活用具的模型以及其他文物，如亭台、楼阁、仓廩、门阙、飞鸟等，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当时江南社会生活的历史图景。这些文物不仅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

5. 科学技术研究：出土的文物有助于验证六朝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如炼丹化学实物的发现和农业生产、生活用具的模型与农书文献的相互印证，为当时的科学技术进展提供了实物证据。

总体而言，这些案例说明了考古文物对于深入研究历史问题、补充历史叙述的缺漏细节以及验证科学技术成就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六朝江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六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见解。

三、六朝江南考古材料的历史意义

毋庸多言，秦汉和隋唐代表了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而六朝，则处于秦汉和隋唐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既继承和革新了秦汉时代的传统，同时也为隋唐时代奠定了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种历史意义在众多考古文物中也得以体现。

从上文所述考古新发现来看，不论是遗址、墓葬，还是各类出土文物，都深刻地承载了秦汉时代的文化传统。例如，孙吴建业城采用了“多宫制”布局，明显受到了秦汉都城咸阳、长安、洛阳宫城规制的影响。另外，帝王陵墓和世家大族墓群所展现的丧葬制度，从地面石刻的雕塑风格、地下随葬的遗物样式，再到传世绘画、书法碑帖和各种衣冠服饰等方面，都清晰地反映了六朝时期与秦汉时代传统文化的联系与发展。

至于隋唐灿烂文化在六朝时期的渊源，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三个主要源头：（1）北魏、北齐的制度文化，（2）梁、陈的制度文化，（3）西魏、北周的制度文化。其中，（2）源自江南文化，而（1）主要是受江南所继承的汉、魏和西晋礼乐典章制度的影响，经过东晋到南齐的发展，后被北魏所模仿采用。因此，实际上，这些文化源头也都根植于江南文化，特别

是以今江苏省南京市为中心的六朝都城建康文化。六朝文化对隋唐时代的影响在各类考古文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包括青瓷器等具体器物以及墓志、地券等出土文献。

在整个六朝时代，江南地区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从孙吴国建立开始，再到永嘉南渡后的东晋南朝，经历了大规模的开发。这不仅导致中国古代经济中心首次向南移动，为隋唐时代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还使江南地区的文化和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提升。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六朝时代“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种文化特征在考古出土的许多遗址和文物中得以体现。无论是精心设计的六朝建康城，还是宏伟的钟山坛类遗址，或者充满生活气息的长干里，以及端庄秀丽的南朝陵墓神兽，还有各种各样令人叹为观止的青瓷器，这些珍贵的考古遗迹和文物都在述说着六朝延续汉代，为唐代开创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述说着江南地区对于传承华夏文明、延续中华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 [1] 刘淑芬. 六朝的城市与社会[M]. 台北学生书局, 1992年.
 - [2] 卢海鸣. 六朝都城[M]. 南京出版社, 2002.
 - [3] 郭黎安. 六朝建康[M]. 香港天马出版社, 2002年.
 - [4] 武廷海. 六朝建康规画[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 [5] 宿白: 《中国石窟寺研究》, 文物出版社, 1996年, 114-144.
 - [6]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后头山东晋墓发掘简报[M]. 东南文化, 2017年第4期.
 - [7]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M]. 东南文化, 2015年第4期.
 - [8] [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 六朝帝陵[M]. 南京出版社, 2004.
 - [9]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 2001年, 第3页.
 - [10]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208页.
- 作者简介: 赵壮, 1989年生, 历史学硕士,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
-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江苏文脉”专项: “六朝文化研究”(23WMB013)。